

騎象入京：南方大女主的故事

時 間：115 年 4 月 22 日（三）13:00-15:00 直播¹
地 點：國立臺東大學人文學院禮納布人文講堂
主 講 人：胡曉真（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主 持 人：靳菱菱（國立臺東大學副校長）
與 談 人：簡齊儒（國立臺東大學華語文學系教授）
記 錄：國立中正大學人文沙龍團隊

主講人胡曉真教授指出，「女主」之稱一般指中國封建社會中男主之母、妻（妾）、女兒等，以某種直接或間接方式參與或干預政治，並對政治產生一定影響的人，較為人熟知者如武則天、慈禧太后等。然而，在不同的政權關係下，特別是在分裂、割據、羈縻（朝廷對邊疆的間接統治）等情況下，宮廷以外的女性執政者也可被視為是一種「女主」形式。其中，邊疆與少數民族地區的土司制度其實是相對於中央王朝直接統治的地方治理體制，而土司特殊的繼承制度孕



圖一：（左起）主持人靳菱菱教授、主講人胡曉真教授、與談人簡齊儒教授

¹ 講座影片：<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Gp2ymPR1y4>。

育了「女主」誕生的土壤，也反映出不同地域與族群文化中女性角色的差異。土司制度採用了與中央王朝類似的世襲制，換言之，土司統治可謂是「國中之國」。需注意的是，這個「國」並不同於現代社會所認知的「國家」，但確實仍具有相當的內部政治權力，以及被王朝認可的繼承制度。胡教授認為，地方政權如果出現足以影響政治，甚至實質統治的女性，也可視為是「女主」。不過，相較於王朝宮廷的「女主」，這些位處於邊緣的女性，在文學敘事中有著不同層次的表現，也給予了文人不同的詮釋空間。位處邊緣而又具有執政權力與慾望的「女主」，經常被中央王朝定義為「女酋」。「女主」與「女酋」的形象時而背行，時而交錯，本次講座將透過不同類型的文本，建構出女主的譜系及想像空間。

胡教授首先談到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刊刻的《南陵無雙譜》中，有一幅「譙國夫人冼氏」的圖像，圖中冼夫人（522-602）身穿鎧甲，攜槍配劍，明顯與一般明清仕女畫的文雅纖秀截然不同，尤為突出她的軍武特質。冼氏是六世紀在「高涼郡」地區（今廣東一部分）歷經三朝（由南朝的梁、陳過渡到南北統一的隋朝）的女性統治者，其家族世代都是南越地區的首領。「南越」就是廣東地區的「百越」，後來發展為黎族、瑤族、畚族等族。梁朝時期，冼氏與高涼郡（轄區在今日廣東省西南一帶）太守馮寶（507-558）結婚。馮寶原是出身北方的北燕（五胡十六國之一）皇族後裔，不難看出這場聯姻是基於穩定地方的政治利益。史書記錄當南朝梁、陳鼎革之際，冼氏先是阻止了馮寶介入侯景（503-552）之亂，其後又歸附陳朝，使得百越得以安然無恙。冼氏為向陳朝表達歸附之意，曾貢獻「扶南犀杖」。扶南約為今日東南亞湄公河三角洲地區，犀杖則是使用當地犀牛角製成之物，極具地方特色。此杖在陳朝覆亡後流入隋朝，時任晉王的楊廣（569-618，即隋煬帝）命陳後主寫信要求冼氏歸化新朝時，便附上此杖作為信物，冼氏隨即歸順隋朝。冼氏其後曾親自出兵幫助隋朝平定地方反叛，隋高祖因而追封馮寶為廣州總督譙國公，封冼夫人為譙國夫人。

《隋書》記錄冼氏將梁、陳、隋三朝賜物各建一庫珍藏，每歲向子孫展示並訓誡：「我事三代主，唯用一好心。今賜物俱存，此忠孝之報也。願汝皆思念之。」冼氏之語顯現出其效忠中央政權，而非僅忠於一家一姓的政治大義，以及從而發展與保全地方的生存策略。前述《南陵無雙譜》中的「譙國夫人冼氏」的圖像，對頁題詞說道：「百越部落長晏然，夫人撫馭七十年。中州男子三易姓，區區一婦總其令。」這段題詞直指冼夫人成功統治百越地區達七十年，對比於中原王朝頻繁地改朝換代，冼氏的治理顯得更為成功。在後世流傳的敘事中，冼夫人也成為嶺南女主的最高典範。



圖二：《南陵無雙譜》中「譙國夫人洗氏」圖像（圖源：講者簡報）

晚明謝肇淛（1567-1624）在其《五雜俎》（或作《五雜俎》）中述評洗夫人，他說：「高涼洗氏以一蠻女，而能拊循部落，統馭三軍，懷輯百越，奠安黎獠，身蒙異數，廟食千年。其才智功勳，有馬援、韋皋所不敢望者。孀子軍、夫人城視之，當退十舍。而徵側、趙姬輩無論已。」這段評語將洗夫人與東漢馬援（14B.C.-49）及唐代韋皋（745-805）進行比較，兩位男性都曾在南方建功立業，謝氏卻認為洗夫人的才智功勳遠勝於馬、韋二人；在女性方面，謝氏以唐代平陽公主（590-623）所領娘子軍，以及晉朝韓夫人築城抵抗前秦苻堅（338-385）之事為例，也認為不能與洗夫人相提並論。這段話最後提出了「徵側、趙姬輩」作為對比。事實上，前述馬援遠赴交趾所平定者，即是徵側與其妹徵貳，史書中將其稱為「二徵之亂」，但在越南歷史中，她們卻是傳奇性的開國之主。在《大越史記》中，徵側被稱為「徵女王」，稱其「在位三年。王甚雄勇，逐蘇定，建國稱王。然以女主，不能成再造之功。」儘管交趾早已在東漢的直接統治下，且徵側建國稱王也僅短短三年，但在越南民眾心目中已是不朽之業，徵側姊妹在死後也為當地人奉祀為神。在近代越南的民間版畫「東胡畫」中，常描繪二徵夫人騎著大象，率領軍隊反抗漢朝軍隊、追擊蘇定的英勇場面。現今越南河內仍設有規模宏大的「二徵夫人廟」，廟內前庭立有石象與戰爭浮雕，正殿供奉二徵夫人塑像與畫像，並有「南邦節烈」、「地維以立」、「冠古女雄」等匾額，彰顯其在越南歷史上的崇高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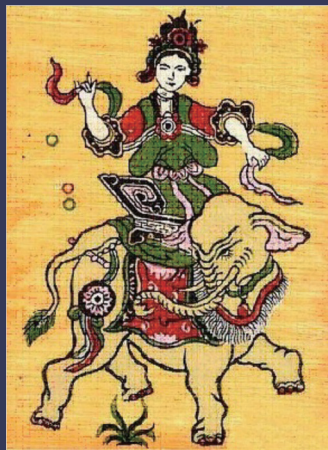
圖三：二徵夫人廟前庭石象與正殿「南邦節烈」匾額（圖源：講者簡報）

至於趙姬則是三國時期帶領九真郡（約今越南北中部）人民反抗東吳的領袖，後來也成為越南人崇拜的女英雄。相較於徵側姊妹，趙姬在文獻中被賦予更為鮮明的形象。胡教授引述《大越史記》中對於趙姬形體的記錄，其云：「後九真女趙姬，姬乳長三尺，施於背後。常乘象頭與敵交戰，聚眾攻略郡縣，胤平之。《交趾志》：九真山中有趙妹女子，乳長三尺，不嫁。結黨剽掠郡縣。常著金褐齒屐，據象頭鬪戰，死而為神。」這段描寫中包含趙姬異於常人的身體特徵（乳長三尺）、裝扮（著金褐齒屐）及動作（據象頭鬪戰），在近代「東胡畫」中，亦可見特別表現騎象姿態與發達乳房的趙姬形象。在極端突出的形象塑造上，趙姬與嶺南的另一位冼氏發生了重疊，胡教授亦引述清初屈大均（1630-1696）所撰筆記《廣東新語》，書中稱「冼氏，高州人，身長七尺，兼三人之力。兩乳長二尺餘，當暑遠行，兩乳輒搭肩上。」此處的冼氏為秦末趙佗（約 240-137 B.C.）建立南越國時，率領高涼軍民投靠的歷史人物，有別於南朝、隋朝之際的冼夫人。

明末清初的吳偉業（1609-1672）創作的雜劇《臨春閣》，應該是最早以冼夫人為主角的戲劇作品。學者多認為吳偉業寫冼夫人，乃是以南朝之亡寄託南明之亡的哀思，抒發了作者的興亡之感。劇中的冼夫人顯現出其憂國憂民的一面，她在進京晉見陳後主時，與貴妃張麗華（559-589）交換對國是的意見。一般傳統文人筆下的張麗華，若不是作為「女禍」的代表人物，就是被命運擺弄的無奈女子；但吳偉業的創作中，選擇將張氏描寫成一位以國事為重、有謀有識

的女性政治人物，與冼夫人在政治見解上形成同盟關係。相較於張麗華以才女之姿力圖救國，冼夫人所展現的則是守邊護國的女將形象。在《臨春閣》第一折中，冼夫人出場的裝扮是「戎服錦傘」，她在唱詞中將自己與古來男女英雄並列，自述受皇命「巡視諸邊，那各路諸侯，外邦君長，齊集轅門，聽吾將令」，之後嶺南、嶺北各州刺史進見，次則「緬甸國、扶南國、真臘諸國使臣」，勾勒出一幅南方的國際地圖。後續的唱詞透過一連串詞彙描繪外國風貌，展示出冼夫人作為中國代表進行外交任務的姿態，也述及西南各地土司，責備這些土司叛服無常。吳偉業在劇中觸及中央朝廷與南方土司的關係應非偶然，可能是藉由冼夫人形象影射晚明四川女土司秦良玉，強調其對於朝廷的忠義。

胡教授指出，女英雄故事常引起注意，也經常成為文學創作的素材，而女性土司又有其特殊地位，在筆記、詩文或小說戲曲等文學載體中都可見女土司角色的登場。這些女土司既是女性又是「異族」，又是掌握權力者，她們的事蹟對於中國文人有著獵奇的吸引力，也常啟發文人想像，乃至促成對「中央／邊緣」、「漢／非漢」的思索。南方這些集軍事與政治能力於一身的女性，逐漸在文人筆下成為一類群體，也可說是一種譜系。如冼夫人是作為歸化、維護中原政權的象徵；而徵側與趙姬，隨著越南脫離中國統治，她們被視為越南開國女王與民族英雄，則是另一種抵抗與異質的代表。事實上，文獻紀錄中不乏女土司叛變的歷史事件，如元成宗大德五年（1301）時，朝廷派軍自雲南出發征討西南夷的「八百媳婦國」（位於今泰國清邁與緬甸撣邦一帶），大軍行經貴州時，領軍



越南東胡畫

- 後九真女趙姬，姬乳長三尺，施於背後。常乘象頭與敵交戰，聚眾攻略郡縣，胤平之。《交趾志》：九真山中有趙妹女子，乳長三尺，不嫁。結黨剽掠郡縣。常著金褐齒屐，據象頭鬪戰，死而為神。

圖四：《大越史記》中對於趙姬形體的記錄（圖源：講者簡報）

將領劉深以軍需為名向當地土司征斂，貴州水東地區的土司宋隆濟因而發難叛變。隨後，水西地區女土司奢節也舉兵響應（奢節在不同漢文史料中有寫作「蛇節」者，乃音譯不同之故；其夫水西土司阿畫於 1297 年去世後，由其繼任為土司）。最終，元成宗迫於壓力決定撤兵，並殺劉深以謝天下，叛變的宋隆濟與奢節也在大德七年（1303）時被俘處決。

如果將奢節故事視為反抗中央王朝的女土司代表，那麼另一女土司奢香則是和平妥協的反向參照。嘉靖年間的文人田汝成（1501-1557）《炎徼紀聞》中，以小說家筆法記載了奢香的故事。其描述元末水西土司名叫霽翠，在入明後歸附明朝，其卒後由妻奢香繼立，而霽翠正是前述奢節之夫阿畫的同族後人。故事中，奢香在面對明太祖與官員的軍事壓力時，選擇進京訴冤並進行政治協商。她以「刊山通道」（開闢道路）為條件，換取中央對土司自治的認可與和平。胡教授認為，田汝成所描述中央王朝與邊疆政權之間的政治協商，是一個文學性很高的精彩故事。

從奢節到奢香，這兩位女土司都是繼承丈夫的職位。後代文人往往以後見之明，將女土司們的政治抉擇歸類為「效法二徵」或「學習冼夫人」兩條路線。清代文人為了符合國家的政治利益與儒家倫理，刻意建構了一條「理想的」南方女主譜系。如吳嵩梁（1766-1834）在詠嘆奢香的詩中，刻意淡化了她為保全地方自治所做的政治謀略，將其純粹詮釋為「忠貞報國」的命婦。除了這種理想化的忠義形象外，女土司真實擁有的強大權力與叛亂潛力，其實帶給漢人官員極大的威脅感與焦慮。女土司因其性別角色，更多了一層所謂「陰性力量」的隱喻。如明代文人陳繼儒（1558-1639）便視女子為政為「諸蠻尚淫」，將非漢族的女性掌權解讀為一種不合儒家禮制的越界行為，深刻反映了漢人文人面對少數民族女主政治時的集體焦慮。

講座尾聲，胡教授以明代宣德年間（1426-1435 年間）雲南楚雄地區女土司高思弄為例。她「自卸冠帶，作土婦裝，騎象入彰義門」進京朝貢，引發北京萬人空巷地圍觀，並因而被繪製成《土婦貢象圖》。高思弄刻意展現異族風情的「表演」，巧妙地結合了「據象鬪戰」（狂野的女酋）與「騎象入京」（歸順的女主）兩種極端形象。這說明了在文人建構的南方女主譜系中，正像（忠誠歸化）與變像（抗拒異質）其實是相依相存、難解難分的。這種對南方女主的探討，不僅豐富了我們對帝國邊緣與性別問題的理解，也展現了文學敘事的多樣性。